

人類有上帝的形象， 上帝又是誰？

林登。拉魯旭
(Lyndon H. LaRouche)

目前，一個文件正在國際新聞界流傳，文中提到一群斯里蘭卡佛教和尚以激烈危險的方式攻擊教皇保羅二世。這個攻擊來源于教皇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名著作《跨越希望的門檻》。【1】和尚們並沒有在書中發現事實上的錯誤，他們說該書太具抨擊性，說教皇違反了『政治準確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原則。

這個爭議中所包含的問題與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爭辯說可證明無辜的證據并不足以停止對其死刑的執行的情形是相同的。難道我們的道德已經墮落到了離開真理和正義的原則而去進行司法審判的程度嗎？同樣，我們是否以經到了這樣的衰變點，以至于鼓勵人們去僅僅熱衷于個人感情便支持他或她對一個特定宗教或某信仰的選擇，而不至于抨擊敵對觀點而顯示人本身的信仰是基于對真理的信奉呢？

由和尚報怨直接導致這個有關真理問題的提出，引出了對在學術上稱為宗教現象學的一種敵對性評論。我們在此的目的是從學術的角度討論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在他的臭名昭著的『宗教經歷的多樣性』一文中所暗示的，或者納粹哲學家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直接明講的這個問題。尼采主義者 (Nietzschean)海德格以神學教育所形成的持續影響同現今恐怖主義運動所編造的，存在主義稱之為『解放神學』的最為相近。值的注意的是所謂窮人運動的國際恐怖組織之一『扎帕提司達』(Zapatista)在墨西哥洽帕省的活動。

每一種諸如此類的錯亂，真理和理性都被扔在一邊，取而代之的是放到統治地位的非理性個人感覺。和尚們抱怨的心理同海德格的現象學是一致的。經常被違反的進行正義判斷的義務乃是

真理的僕人，事實是神學中的存在主義領導了洽帕省的恐怖主義造反。這些現象中暗含著重要的原則。在此我們將檢視這些原則。

我們討論此事時不僅作為宗教事務來進行。我們從國家領袖的角度來看待從事，例如，公民信仰宗教的哪些方面顯示了改變獨立，聯邦憲法，和美國發展的正面影響？我們在此先從和尚們的攻擊言論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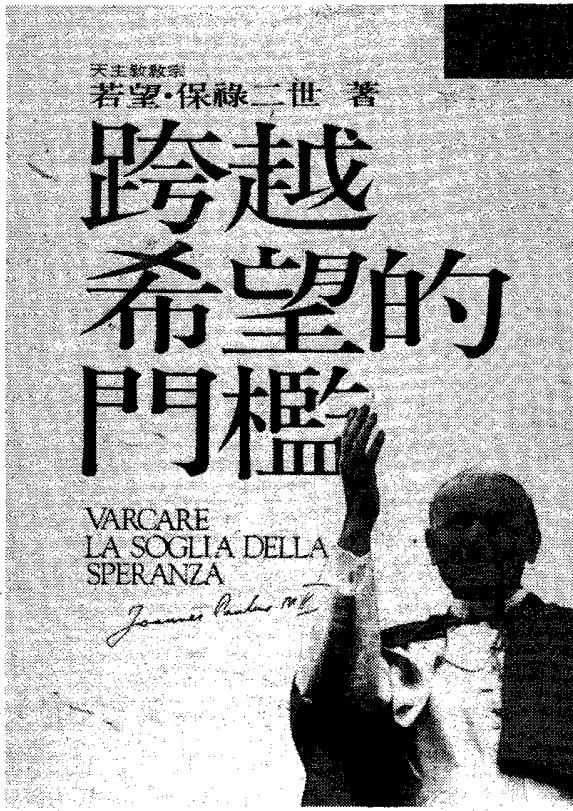
教宗的原始言論

爭論的原則是：從和尚特別宣布的段落開始。如下是教宗保羅二世在他英文版書中提到佛教時的原話：

佛陀所體驗到的『頓悟』，可歸結為徹悟到的世界是惡的，是人罪惡和痛苦的根源。為了從罪惡中解脫，人必須從世間解脫，使我們自外在現實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這種束縛存在于我們的天性，我們的心理，我們的肉體上。我們越是從這些束縛中得到解脫，越是對存在世間的一切不動心，越能從來自世間的痛苦與罪惡中得到解脫。

我們這樣作是否就接進天主呢？在佛陀所傳下來的頓悟中，並沒有談到這一點。佛教極可稱的上是一種無神論的體制，他不是透過來自上帝的善，使人從罪惡中得到解脫，而是通過脫離這罪惡的世界而得救。這種完全的脫俗並未與上帝結合，而是所謂的磐涅，是對世界完全無動于衷的境界。總之，個人的得救是擺脫罪惡：藉著對世界的不動心，而此一世界乃是嘴惡的根源，這是靈修過程的極至。

為了尊重和尚有關的意見，現將有關論點敘述如下。為了顯示這個問題的權威性，我們從摩



西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教義都承認上帝存在這一點出發。在此的示範意義是，關於上帝的觀念，在柏拉圖(Plato)的對話中嚴格而清楚的表現出來了，這是可以明確鑒定的。在古代的儒家傳統和古印度的傳統中也有關於上帝的某些近似的表述。否則便沒有宗教信仰關於摩西傳統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中所承認的上帝。

如下的論點是上述觀點的推論。在有組織的宗教中關於神的所有敘述，無論是現今的歷史的還是史前的，只有摩西傳統中關於上帝的存在才是凡人能以智慧證明的。在所有其他的宗教當中，上帝的存在只是非理性迷信的異教徒之至命現實，對於他們來說神只是盲目信仰的現象。我們將在隨後宣示，基督教神學的方法乃是根植於蘇格拉第方法(Socratic method)，而蘇格拉第的方法又被柏拉圖用于他的提麥斯篇的對話(Timaeus)當中。這是一個優點，我們從此出發來評論和尚抱怨的政治意義。

由於問題涉及廣泛，在此我們將重點放在最敏感的地方，這涉及基督教理論和實際兩個方面。我們在歐洲二千六百年的文明進程的範圍內檢視這些問題。【2】我們把和尚的問題置于那些對抗基督教的寡頭邪惡的蠻人，法國查里曼大帝(Charlemagne)和路易十一(Louis XI)的封建主義對手

以及目前反基督的英國君主制的矛盾當中。【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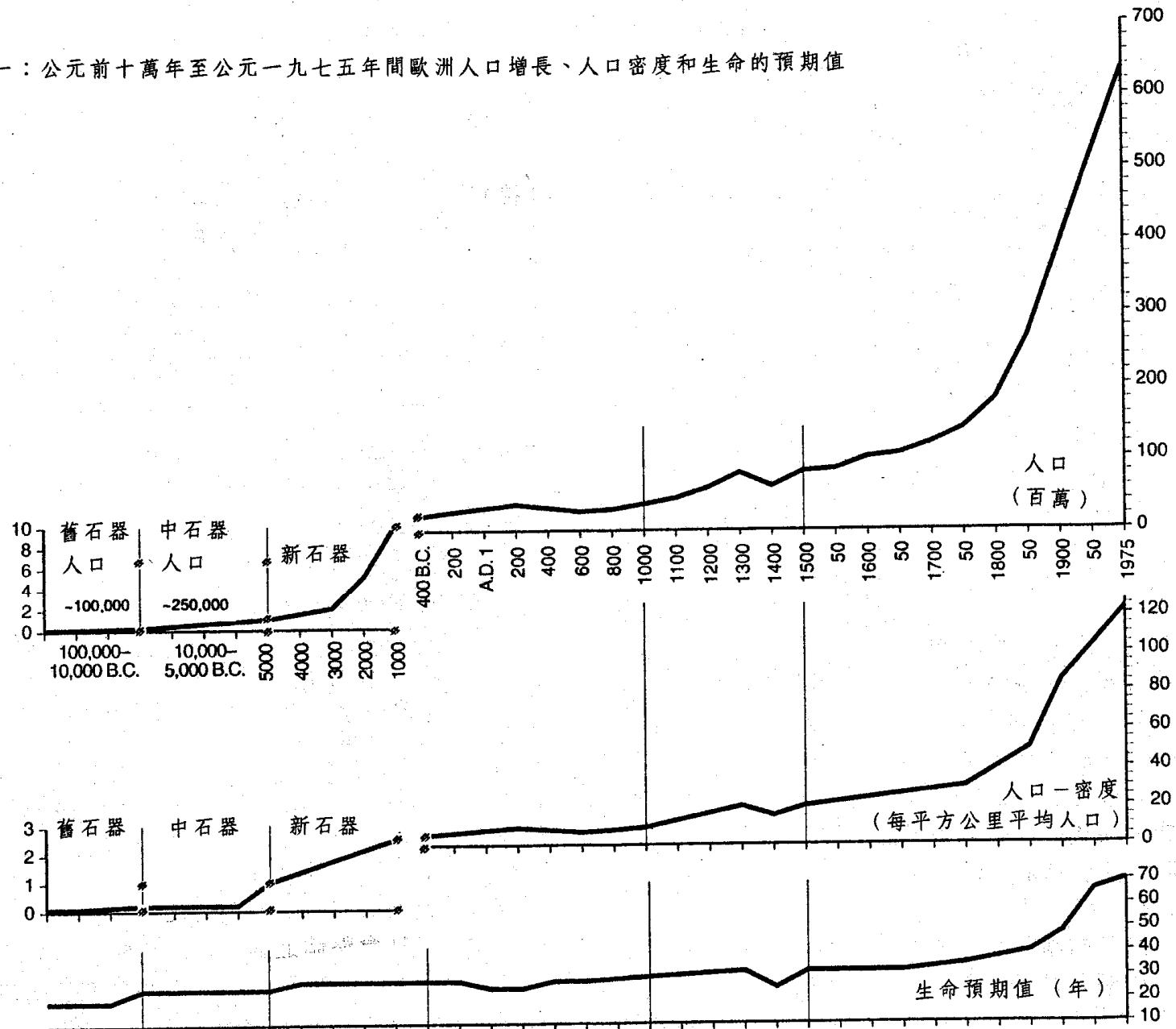
斯里蘭卡和尚應當好好閱讀聖經舊約第一章的創世紀，在這一章中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體現了他們信仰的關鍵。最關鍵的而且可以得到科學證明的地方在第二十六至三十節：提到了人的產生，在二十七節中有這樣的記載：『所以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做人，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男人，女人，創造了整個人類』。摩西在這一章中重複的提到上帝看到他創造的宇宙和世界，他是滿意的。在第十一節的結論中說上帝審查他自己的創造是一個完美的整體，其中包括人類：『很好，都很好。』這個上帝，愛世界的上帝，那些試圖逃離世界尋求涅槃是無法理解的。這難道不是摩西傳統的相反位置嗎？這難道不是和尚們攻擊的真理嗎？

費羅的摩西 (Philo's Moses)

在此題之外，我們參考到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任葵斯(Renquist)和他的意見相同者在死刑問題上對真理的可怕背棄，這個錯誤在本質上同和尚們的錯誤是同一類。我們在死刑問題的意見上認為不顧人類個體生命的神聖同不顧真理的原則是一致的，最近以來，這種不顧真理的傾向這美國的司法和其他法律過程中不斷的加強并佔據統治地位。我們看到腐敗的趨向從美國司法實踐反映出來，以社會整體邇言，這是一種不顧真理原則的發展趨勢。這種趨勢與前三K黨員和美國最高法院法官布萊克(Hugo Black)極端錯誤的解釋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關於禁止以政府權威設立教會問題是一致的，例如禁止在美國設立象英國一樣的國教。這個大法官雖然不對整個國家的道德淪喪富有全部責任，但他的負面影響確實很大。

後來，布萊克要求在美國公共生活中間禁止基督教。明顯地，他忽略了一個事實，即普遍的無神論及其自由主義假象，以及特別是赫胥利(Thomas Huxley)的英國式不可知論，實際上都是異教徒宗教信仰通過葆羅·夏皮(Paolo Sarpi)的追隨者們的英-法『啟蒙運動』所發生的影響。實際上布萊克並沒有將政府和宗教分開；他是努力在美國建立英國式的異教式宗教（例如無神論）。他這種不合理的教條實際上同和尚對教宗新書的攻擊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圖一：公元前十萬年至公元一九七五年間歐洲人口增長、人口密度和生命的預期值



一 所有圖中數據均由各類人口研究報告中選出。本刊所用精度僅供說明，在某個局部人口統計數據可能變化很大。

同布萊克相反，美國聯邦憲法第一修正案對於宗教的本意乃是，任何宗教只要不在現實生活中鼓勵非法活動，國家就必須允許當時各種宗教自由活動。這種情況下，禁止由國家建立教會對宗教信仰沒有負面的影響。

我以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歷史上已經獲得接受的理解來辯白：當一個宗教試圖對於社會施加影響地時刻，一個不同的，正面的那種正義的影響便表現出來。對每一個宗教團體來說，他們的意見也許是「盲目的信仰」；當每一個宗教團體只是要把他們的合理合法的意向家加于國家之上時，這「盲目的信仰」便犯規了。

從整體上看社會，必須應用以下普世基督教

會的原則。所有特別的宗教意見，都要在社會合法的條件下實行而且必須是智力上透明：必定有完全可知的證明，且不僅是以論證的形式，而是在任意一個情況下，都存在於該論證的推理基礎——那些公理性預設(axiomatic assumptions)當中。

在這種事件瀕，無論是國家還是其法庭都不允有干蠱事的特權。宣誓效忠美國憲法的政府官員受到美國憲法意向的約束，明白那些宗教的原理權威性地確定著美國憲法的原本意向。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憲法形成的那個世紀，對於選民和該時代的世界來說，無論男女，即便是文盲和傻瓜都會受到責備，如果他對表達這些基本原理

表一：人口的發展

	壽命預期 (年)	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 評論	世界人口 (百萬)
靈長類動物對照			
大猩猩		1/km ²	.07
黑猩猩		3-4/km ²	1+
人			
Australopithecines B.C.4000000-1000000	14-15	1/10km ² 68%死于十四歲前	.07-1
Homo Erectus B.C.900000-400000	14-15		1.7
舊石器時期(狩獵-采集) B.C.100000-15000	18-20+	1/10km ² 55%死于十四歲前 平均壽命二十三歲	
中石器時期(原始農業) B.C.15000-5000	20-27		4
新石器時期 B.C.10000-3000	25	1/km ² 農業革命	10
青銅時期 B.C.3000-1000	28	10/km ² 50%死于十四歲前 村落旱地農作法 Baluchistan 5000 B.C.: 9.61/km ² 城市的發展 Sumer: 2000 B.C.: 19.16/km ² 早期青銅時期: 愛琴海 3000 B.C.: 7.5-13.8/km ² 晚期青銅時期: 愛琴海 1000 B.C.: 12.4-31.3/km ² 中國商朝: 1000 B.C.: 5/km ²	50
鐵器時期, B.C.1000-50	28		50
地中海古典時期 B.C.500-A.D.500	25-28	15+/km ² 古希臘, 波羅奔尼: 35/km ² 羅馬帝國: 希臘: 11/km ² 意大利: 24/km ² 亞洲: 30/km ² 埃及: 179/km ² * 中國漢朝: B.C.200-A.D.200: 19.27 山西: 28/km ² 陝西: 24/km ² 河南: 97/km.* 山東: 118/km ² * *河網及灌渠密布的農業地區	100-190
中世紀的歐洲 A.D.800-1300	30+	20+/km ² 40%死于十四歲之前 意大利, 1200: 24/km ² 意大利, 1240: 34/km ² Tuscany 1340: 85/km ² Brabant 1374: 35/km ²	220-360
17世紀的歐洲	32-36	意大利, 1650: 37/km ² 法國, 1650: 38/km ² 比利時, 1650: 50/km ²	545
18世紀的歐洲	34-38	30+/km ² 「工業革命」 意大利, 1750: 50/km ² 法國, 1750: 44/km ² 比利時, 1750: 108/km ²	720
馬薩諸塞州 1840	41	90+/km ²	
聯合王國 1861	43	壽命預期: 右-工業化國; 左-非工業化國	1200
瓜達馬拉 1893	24		
歐洲的俄國 1896	32		
捷克斯洛伐克 1900	40		
日本 1899	44		
美國 1900	48		
瑞典 1903	53		
法國 1946	62		
印度 1950	41		2500
瑞典 1960	73		
1970	71	1975	
美國	70	26/km ²	
西德	73	248/km ²	
日本	59	297/km ²	
中國	48	180/km ²	
印度		183/km ²	
比利時		333/km ²	

的誓言表示異議。無論是因為惡意忽視這些原理還是因為無知忽略這些原理，對於美國憲法來說都是一樣的，都須受到彈劾。沒有人能夠一筆廢除這些原理而不使美國憲法成為泡影，這一筆將同時傷害美國整個聯邦制度系統。

設美國國家法律直接建立在摩西傳統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直接與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任葵斯等人關於死刑的錯誤概念相矛盾。

美利堅合衆國乃是緊接著首先確立于十五世紀歐洲的中的政府原則之上而建立的：由法國國王路易十一世和讓·玻定(Jean Bodin)所定義的「共同體」聯邦制度，成為現代國家的基礎。這個國家創造產生的原理乃是基于前述的基督教原則，這些原則從路易十一的聯邦制當中反映出來。這些原理非常生動的體現在一七七六年的美國獨立宣言和我們的聯邦憲法序言當中。

上述事實，回過頭來又使我們不得不考慮關於摩西傳統整體的更深一步的公理特征，特別是基督教的傳統特征：在創世紀第一章第26—30節中關於治國的原理中指出：人類作為「具有上帝形象的人」即拉丁文“*Imago Dei*”。結論：一個如果站在立法機構之前，提出一個完全根植于上述的上帝的公理性概念的命題時，他如何才能明白地證實這個原理既是來源于上帝呢？盲目的信仰，或謹參照前人授與教條的傳統，或其它種種，都不足于明辯。問題在于，對如此的上帝，即用他自己的形象創造人類的上帝的存在，對既非盲目的信仰也非簡單的依靠引述傳統的某個人是可知的嗎？這是一個可以明了的概念嗎？

人們常說，「我相信…」或「我們相信…」，言者真心真意，但是人們在說此話時並沒有提出明白可知的上帝的定義。確實的象這種說法的人需要教條但是不需要把教條準確的表述出來；只要想到教條就可以了。確實的，應當把這種情形記錄下來，無論人們是把它當作何種目的服務。

然而，如果人需要利用上述的公設來說明一個命題，公設必須是明白可知的。對於象使徒約翰·保羅和奧古斯丁(Augustinus)的傳統的基督教神學家來說，這並不代表一個不合理的負擔。有兩個線索可以鑒定這個挑戰的基礎：即參照著名的亞歷山大的費羅(Philo of Alexandria)之例子和柏拉圖

對上帝存在的本體性證明。這個立腳點一旦確立，和尚抱怨的實際性錯誤，和任葵斯及布萊克們可怕的謬誤就立刻被顯現出來。

在談到聖經第一章創世紀的時候，費羅，曾與他的朋友基督使徒彼得(Apostle Peter)一同與有靈知的西蒙魔師(Simon the Magician)鬥爭，把他的重點集中在聖詩第26—30節上，集中在個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創造這個問題上。這裡所指並非肉體上的相象，這裡指的是人類個體潛在創造能力的形象，而重點在於創造這一術語上。

費羅實例的關鍵之處在於確實掌握了柏拉圖的蘇格拉底方法。每個人都被賦予了動物所沒有的智慧潛力。這種對自然界的想象能力不僅在人類之前從來也沒有，而且在一定的限制之下可以將這些理念充分地施加在宇宙中。完成這個事情的條件乃是那個智慧的想象合乎普遍大法。在上帝充分的創造智慧之形象中鑄成的每個人的智慧便是創造性的定義。

這意味著個人在自己的智力形態以內可以進行認識，這智力形態便是上帝形象的反映。

柏拉圖發展了這一觀點，他定義了隨後被他稱為人類創造性這一名詞作為智力形態連續的四個組成。他將這四個部分命名為：前提，大前提，假定前提，和有關上帝存在的非前提性確定知識 (Hypothesis, higher hypothesis, hypothesizing the higher hypothesis,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certainty of the efficient existence of the unproven Good, or God. 或假說，高級假說，假說化的高級假說，和有關上帝的非假說性確定知識——譯注)。運用現代語言可以使柏拉圖的四段論歸納為如下的語言。對於熟悉本文作者在科學方面發現的讀者來說，這方面的敘述也許顯得老生常談，對於不熟悉的讀者來說這個歸納就顯得必要。

關於前提假說的原理

從形式幾何學例如歐基里德幾何學的演繹來開始我們對問題的討論。幾何學是由一系列的公理框架所組成，是尾部開放的一個公理系列，系列中的每一個公理都不與其他公理相矛盾。這種公理之間的和諧一致性意味著公理之間的相互依存性和公理存在的共同基本條件。柏拉圖的蘇格拉底方法當中最簡單的一種便是引證有足夠的假定條件：例如公理和公理的假定條件。

從這一點出發，讀者可以正確的使用被貝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和其他實證主義者錯用的術語：「繼承性原理」。這個術語，盡管被貝特蘭·羅素等人所用，卻指明了公理和公設整合系列之間的關係，屬於某種「原生」原理；如果一個設想在條件和公理上是一致的，它就不會在開放排列的整個公理系列中產生不一致，因為公理本身是一致的。以柏拉圖的術語稱呼公理和公設系列便是：前提。

為了將剩余的三個柏拉圖關於定義人類智慧的術語表達清楚，有效的方法是作一次時間上的大跨躍，從公元前四世紀跳到公元一八五四年六月的哥廷根大學。高斯和底瑞西立(Carl F. Gauss & Lejeune Dirichlet)的聰明同路人黎曼(Bernhard Riemann)講示了自一七九四—一八一四年法國綜合技術學院(Ecole Polytechnique)和高斯本人的偉大工作以來最為基礎的發現，也許是二百年來最為重要的科學發現，它是後來所有科學工作的基礎。年輕的黎曼講示他的發現作為大學教授職位的資格論文。為了感激柏拉圖完整的科學方法，象黎曼一樣評價幾何學和現今數學的最敏感公理系統，在此請允許作者在表述此事時使用自己的術語。

在其最大部分，與現代課堂歐氏幾何關聯的幼稚幾何學并不同物理現實有直接關係，它也不是我們感覺的創造。它必須是一個天真想象的創造。可稱之為「天真視覺形象幾何學」。

與視覺世界不同，天真視覺形象幾何學勾畫出的時間空間世界在四維中是完美連續的：在空間的前後，從上到下，從一邊到另一邊，在時間上的從以前到後來都是如此。柏林的哲學經驗主義者歐勒(Leonhard Euler)以時間和空間的擴展是無限的以及時間和空間是無限可分的來攻擊萊布尼茨(Leibniz)的單子論(Monadology)。歐勒關於天真視覺一致性的爭論被黎曼的工作所打破。正如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所展示的，精確的視覺并非是那種線性可擴展的，也并非完美連續。這種幾何學并非視覺景象，它是一個智力性創造，是天真視覺形象幾何學。

按照夏皮(Paolo Sarpi)，伽利略(Galileo)，培根(Francis Bacon)，笛卡爾(Rene Descartes)和牛頓(Isaac Newton)加以典型化的這種想象，數學物理應當由線性可衡量的定位和時間空間可見形象物體的運動來構成。然而如萊布尼茨和柏努利(Jean Bernoulli)較黎曼一個半世紀以前所證實的，一旦我們介紹了物理上的最少時間和最小動作概念，伽利略和牛頓等人的簡單的代數物理便分崩離析了。在這種情況之下，黎曼關於費羅創造性智慧教條的發現便展現出來。

一旦我們介紹了『最短時間』和『最小作用力』的概念作為物體改變物理狀態的基本量，我們便發現實際當中存在著現象使我們毫不懷疑其真實性，但與在數學物理當中廣泛接受的原理卻大相逕庭。以形式主義的術語來表達這一點，便是這些不規則的現象強迫我們去重新檢視正在使用中的公理和公設，去產生新的一組的公理和公設，而一致於各種現象，包括那些反常的重要現象。這種工作表現了以新的較好的假說，即柏拉圖所稱的前提，去代替舊的假說。

對假說需要改變的發現表現了創造性發現的最本質因素，它把創造性的發現從非創造性的工作和一般邏輯推理中區別開來。盡管我們只是在數學物理方面引證了這個道理，但偉大的創造性原理在古典詩歌藝術，音樂藝術，悲劇藝術和繪畫藝術方面都具有它的普遍性。

在這種情況下，并在其余三項創造性智慧當中，普遍真理的更真實的發現的行動過程的闡述，從解決本體悖論的角度可以由柏拉圖在巴門尼德篇(Parmenides)對話表明。在對話中，柏拉圖對形式邏輯不留情面地推論，直到其產生荒謬的結論。所要發現的『一』('one'，柏拉圖在對話中與多'many'相對的觀念——譯注)，是一種行動過程的統一形式，它將包含每一個以及全體變化。這些變化定義了一些事實的集合，且以這些事作為函數上相干的聚集的元素。例如，要包括在經證實過的相關事實集合中的一個同樣經證實，但又異常的命題時，它便迫使我們建立即適合以前發現的事實又適合新發現的事實之理論。它所發現的新原理就是新假說，就是『一』個包含了所有事實的新假說。

重複過去我們頭腦創造性發現的經歷能夠使我們熟悉自己創造性潛力，我們必須用它來使原來的發現再產生出來。這能夠使我們產生創造性發現的能力變為一種自覺的想法：它對我們顯示出是一種實際存在的現象，由於它是影響實際世界，它不是一種感觀現象，它是一種真正的智慧

現象。它是一種思想目標，一種萊布尼茨的「單子」(monad)，一種柏拉圖著作中的「觀念」(idea)，一種黎曼所稱的「精神」(Geistesmassen)。

從此點出發，我們便能夠發現高一層次的智慧目標，高級假說，或者一個liangz連續創造性發現的有效原理(例如，假說)。這在開普勒(Jonannes Kepler)的著作中顯現為理性。例如，它顯現為幾何學理念中的一種新方法，黎曼所發現之物理學時空當中的「曲率」。

我們現在有了一個途徑，由途徑我們便可得到相對高級的產生有效假說發現的原理的原理。這種從產生過程上總體把握高級假說的術語叫做「假說化的高級假說」。這個過程肯定地提出了上帝的存在。他並非任何一種自然神，而是費羅和摩西所稱之上帝。

簡而言之，須從人類整個創造性發展和宇宙類似的發展來看問題。「所有創造性的發展」都基于一個單一的有效創造性智慧，如果將時間和空間算作一個單一不可分割事件，那麼這個智慧存在于所有時間和空間當中。這便是柏拉圖所稱的「善」或「上帝」。

何物為真？

「真理」是現實的；「真實」是對該現實的有效發現。在整個科學史當中，真實的質量由柏拉圖的蘇格拉底方法所了最好的界定。數個世紀以來，柏拉圖現實觀點的反對者一直依靠堅持說柏拉圖的辯證法只是很精明，但那只是因為他置現實于對理想的境界，它在感官的現實中是謬誤的。為此，我們有了各種各樣形式主義文盲對柏拉圖「理想主義」的非難。

同馬克思主義和其他對柏拉圖「理想主義」批評者相反，所有物理科學領域里的知識均來自於實驗證明，都單從物理經濟學領域而來。在此和尚們的，宗教現象學者們，及雨果·布萊克的個人崇拜者們的爭論，以及對柏拉圖的批判均象破船一樣被拋棄：他們被徹底粉碎了，具有諷刺性的是，他們撞上了數學，物理經濟學現實的堅硬礁岩。

「形而上學！」這是最了解情況的反對者對我們上述描繪所喊叫的。對唯物主義和經驗主義來說，「物質的」乃是屬於那些可以感覺的。他們是自己感覺確信中「盲目信仰」的犧牲品；他

們是天真視覺影像時空觀的獻身者。對於他們來說，一些智慧上但非感覺上確定的東西可能成為感覺領域中變化的有效原因，這種情形便「只是形而上學」。

牛頓的有句 "hypotheses non fingo"就是這個問題的一個例子。牛頓除去他自己最喜好的黑色魔技藝術之外，是不接受形而上學的。【4】當黎曼在大約兩個世紀之後對牛頓的口號以最善意指出為「自欺欺人」時，他認為牛頓關於慣性的想法乃是在描述相象時空運動假說重疊的一個產物。牛頓在無知的使用「假說」一詞時，同他在該問題上的公理性悖論乃是一致的。

在實際上，假說在想法上同更高的效率相連，這種情形只在上帝和人類的智慧中才具有：整個有效的想法指導著低級感覺現象領域內的運動就象牧羊人按照自己的意志指揮羊群一樣。正是在這些問題上，柏拉圖的批評者拒絕自然中有效的存在，正是這些問題證實了聖經創世紀第26—30節中的真理。這方面的關鍵證據本作者近半個世紀以來在各種場合多次的發表過，在此，將其摘要如下。

如果人類真如菲立普王子(H.R.H. Prince Philip)所描述的，僅是一種高級猩猩，那麼世界人口數目自新生代(Cenozoic)的二百萬年以來決不會超過類似雜食動物的高級猩猩族的密度：人類決不會超過數百萬人口。試考慮關於這方面研究將更會證明上述觀點。有關衰敗文化研究指出，這些文化中的人口已經崩潰到所謂的「原始」狀態，即大都過著象猩猩一般的「尋食」式的生存方式。

試需要考慮兩個插圖表，人口發展圖和史前和歷史人口分布圖（參見圖一和表一）。圖一引自于「羅素如何成為一個邪惡者」一文中的人口曲線圖。表一即歷史和史前人口則在美國德州參議員格蘭(Sen. Phil Gramm)的『美國的保守黨革命』一書出現過。在全部『動物生態學』特有的每一種動物潛在相對密度固定不變的範圍內，人類的人口歷史，在人類主宰的文化里的人口潛力當中，則處于長波式上升的地位：即在全過程，高於全系列的範圍內如此不斷增長。就最近的發展，即自從公元一四四〇年的歐洲以來，可以看到人類潛在相對人口密度最清楚的發展例證——人類的人口發展按雙曲線的函數快速增長。從這個角度看，人類是從低向高自我進化演替的種屬。

在公元一四四〇年以前，人類就已經在數目上超越了所有任何其他雜食類的哺乳動物，達到了數億人之巨。值得注意的是，自從法國皇帝路易十一建立現代國家的聯邦制（共同體）以來的五個半世紀，人類的總數增長到公元一四四〇年的七倍。

在過去五個世紀里，與此相關的另外一個關鍵因素是，在人類過渡到現代國家產生之前，在每一種文化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農奴制，奴隸制，甚至更惡劣的生存環境之中。在一四四〇年以前，人類總的說沒有過好日子，從未有增長的壽命，小康生活，消費標準提高，或生產合作加強，惶論本世紀的都市發展，及其相關的壽命和生活潛在標準的持續增加了。

如果我們檢視近五個世紀以來的歐洲文化發展中最明顯特征便可得到對問題的清楚印象：第一，政治權力當中從來也沒有能夠完全根除有害的舊寡頭制度；第二，近三十年來「新潮」的角色是扭轉近一個世紀來呈上升趨勢的技術進步。在這兩個重要的觀察之下，可以公平的說，在人類存在的所有歷史過程中，從來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同建立現代國家以後在人類在增加征服自然的能力的增長率相比較，比較的標準是每平方公里土地每戶每個勞動力的生產能力。

但是，現代國家對人類發展的特殊貢獻也把一個的同樣的原理帶入一個關注點，這原理對約二百萬年來人類發展舉足輕重，而這二百萬年根據某些古生物學家所推言正是人類已經在地球上存在的歷史。人們粗略鑒定的「文化」概念乃是人類知識和行爲在千百年間所積累起來的一個綜合反映。為此目的，我們可以將「文化」視為有鑒定意義的知識類別，是與科學，技術，語言和自希臘以來看作古典藝術的歐洲傳統相連的知識類別。迄今為止也許這些變化有效地影響著潛在人類生存條件的增進，它們把造成物理科學領域中的公理革命性變化的相通的發明集合起來。

在此歷史背景上可以看到，真理不屬於已經知道的東西，真理存在于人類得到知識的連續過程中。簡言之，我們有關真理知識的本體論最初形式並非關於某種特殊的感覺現象，而是展示人類征服宇宙能力發展過程中進行科學發現所得之原理。這些原理隨著特殊現象的產生而迅速發展。正是這種發展變化增加了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

：以每平方公里土地每戶每個勞動力的生產能力作為衡量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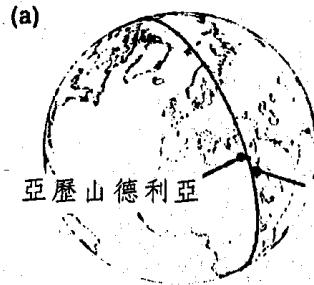
讀者可能聽到過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540?-470?, 古希臘哲學家——譯注)的名言『變化之外無恆事』(nothing is constant but change)；一個人的思想應當行進到柏拉圖在其的對話錄巴門尼德篇中的本體悖論：解決矛盾的鑰匙乃是從一個系列的個別現象轉換到定義該系列整個現象的全體的可引證的變化原則。本體論的現實是包含每個及整體的那個『超限數』(transfinite)有序化原理而不是表達系列中的一個現象。

高級假說將上述所提之變化定義為本體上對真實的相對的初始表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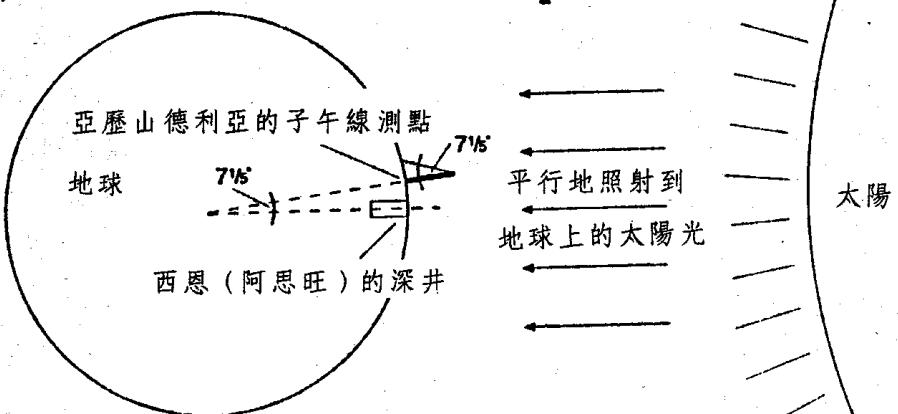
在夏皮，伽利略，牛頓等人追隨從者們的偏見里，直到盲目的宗教迷信者們的存于天真的想象當中，屬於基本的是局限在個別的感覺現象。按照一般課堂數學所表達的『盲目信仰』的異教徒想法，物理科學乃是線性可見的時空當中的運動。在描述這種運動時，無論虛實，那些可憐的異教徒只是以個別感覺現象的列族(array)片面的方式去研究作用力和遠距離行為之間的各種關係，并將一個列族中的互動作出倆倆(pair-wise)明確感應的分析。

在真實的宇宙當中，物質的變動是很不同的。無論是粒子的存在還是它們在時間和空間中的位移都不是最原始的，所謂原始的乃是粒子在整個時空中的變化和過程及其對原理的影響。這些變化的概念在人類征服自然的更高層次上被拿出來作比較，以每平方公里土地每戶每個勞動力的生產能力進行比較。于是，當經驗主義者迷信的依賴於特殊現象，以它們作為分析方法的起始點時，科學卻從柏拉圖，開普勒，和黎曼開始。科學從某些發現開始，該發現作為理念能夠增加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和另一方面的科學發現，它們的形式上的表現是絕對的非連續性區分一個優先『理論架構』于其優先，即從較低假說中產生出來的新的高級假說。

於是科學自上而下，從物理時空的公理性整體特征開始。經驗主義的迷信則從個體的最小感覺假定開始。經驗主義把重點放在個人從感覺現象得到的刺激上邊；與此相對比，科學把重點放在連續進步的過程上，這種進步增加了人類駕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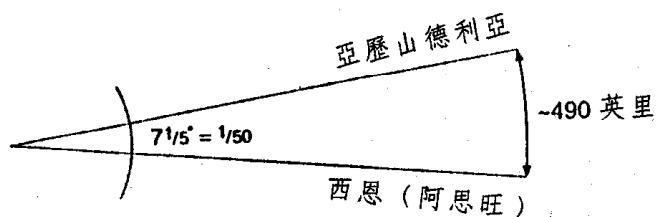


(b)



圖二：(A) 埃拉托色尼對地球圓周的測量是基于找出亞歷山德利亞和西恩（阿思旺）之間的弧度。上述兩個城市位置接近于同一子午線上。步行距離為490英里。(B) 當陽光直射進西恩的一個深井里的同時也在亞歷山德利亞的一座方尖碑下投放了一個7.2度的陰影。(C) 埃拉托色尼異常精確的計算。

(c) 如果 $1/50$ 圓周線 = 大約 490 英里，由此求出地球的周長 = 大約 24,500 英里



自然的能力。這也正是科學發展的目的，是本體論時空觀的本意。于是，真實的即是可明白的，蘇格拉底方式顯示的本體論原始觀。

這便是凡人心智當中 (in the mind of mortal man) 可以明述的『假說化的高級假說』的形式。（參見儒家「明明德」句——譯注）

上帝之愛

我們現在考慮兩個迄今為止已經研究過的關於真實的敏感因素：(1) 真理不是演繹證據的主體為真實的主體不存在於連續的成功當中，非連續的演替對公理和條件系統產生破壞作用；(2) 在實驗的條件下，真實是可以展示的，但真實本身並不作為感覺現象而存在。現實從來也沒有作為感覺現象存在過，只是作為原理展示成為有效的智慧目標，作為一種暗示的形式存在。可演示性的效果表示，人類駕馭自然的能力通過以自己的智慧發現和應用科學原理來增加。

試考慮如下畫面，一個學生通過著名的埃拉托色尼 (Eratosthenes, 276?-194?BC, 古希臘天文學家

—譯注) 的活動來度量地球的大小。【5】教授指導學生進行這項活動的關鍵點是強調在現代航天時代之前，沒有任何人見過地球的曲率。在史前第三世紀晚期，埃拉托色尼運用前人阿里斯塔克斯 (Aristarchus, 217?-145?BC, 古希臘文人 — 譯注) 的方法以弧和角度之間的關係成功的計算了地球的大小，其產生的誤差小於百分之一。【見圖二】在這裡最為敏感的一點是發現本身，它不僅可以使人看到原本看不到的東西，而且使人發現存在物與原本想象的情形相反。

盡管如此，在現今的條件下 — 現代的航空航天技術提供給人們能力可以直接觀測到地球本身，埃拉托色尼和阿里斯塔克斯二人便可以不直接借助於人們的感覺來完成他們的演示。我們因此而得到了一個有效果的，更易于接收的一個有效的思維目標 (thought-object) 存在的演示，而思維目標在我們頭腦中的存在獨立於我們感覺的直接證據以外。

我們將這個例子作為一個典型的大課堂中教

授學生的例子。課堂上有兩個突出的特點：（1）學生需要演示一個已經存在的有效想法，而學生無法在感覺上提出有效想法確實存在的證據；（2）這種想法顯示提供相信天真的自信感覺上的證據之愚昧。它定義了一種發現類別，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只會為不可見的發現過程在内心程序上受到影響。

在同類的每一種情況下，學生開始經歷假說階段，它能鑒定學生以前類似的經歷，每一個成功的例子都產生一個新的假說，新的假說會超越並替換舊的假說。這種新舊假說轉換的過程重複顯示了學生駕馭自然能力的提高。

這便是古典人文主義者的教育方法，這種方法同那種令人頭腦發呆的『教科書』方法相反。十分不幸的是，目前學校中的流行教學方法正是這種方法。

現在讓我們把重點集中在研究發現的三個特點上。（1）課堂上的關鍵概念不能由教科書的描述來傳遞；（2）所有有關發現的工作都與心理（情感）狀態的素質有關，這種素質便來自于上帝之愛德(agape)：『愛你的鄰居』；（3）這一類發現的特徵表現在所有古典藝術當中，這一類的技術進步過程同勞動生產力的進步精密相關：它意味著人類的潛在相對人口密度。

簡言之，對於以上三點來說首先：每一個真正的創造性發現都為一種語言增加一些它原來沒有的內容。每一個學生對以前發現的初級重複的過程對於學生的頭腦來說也是如此。這種想法是無法通過在文字上建立以前語言上沒有的術語來實現溝通的。

下個問題是神對世人之愛德。一個少年開始他最初的創造性發現時，幾乎在他每天的幸福的家里玩耍中都會經歷。一個少年在他早年時候的幸福和情感上的健康程度，取決于他所在文化歷史的創造性發現級別。在兒童的早年，每一個最初的發現在那個時候對他都是特殊的。在兒童的早年品性當中，會有發現的閃光顯現出來，這種極真貴的『閃光』會被家庭的年長成員或學校的教授所發現。這種閃光具有基督教使徒約翰和保羅所稱之愛德(agape)：『鄰居之愛。』

第二種現象直接涉及到捍衛基督教的最關鍵的問題，這便是上帝之愛問題。教宗在他的書中有關章節談到上帝之愛，上帝愛人類，上帝愛這

個世界。這個現象在此值得特別注意。這個客體事務的特性如果經過研討，一個作者自傳性記錄中所增加的那部分能使問題變得更加清晰。

不幸的是，少年常在的歡樂時光在上過幾年學以後就消失了。作者仍舊記得自己少時的在一年級前後的閃光能力和後來在大學時代難于忍受的經歷。多數讀者，盡管大家各自的經歷不同，也會回憶起與作者類似的題目和故事。

最初的時候，問題出現在作者本人發現父母的朋友圈中和自己的學校同學中有不誠實的習慣。即便是對於一個少年來說，也可以發現這些大人和同學在公共場合所言與私下所言不同；顯然他們對同一事物的意見可以因為在不同的場合而花樣百出。因為本作者在他那個年紀的少年中是讀過相當數量參考書籍的人，所以他語法學校的早期就發現，在學校的課堂和課本所教授的觀念經常是自相矛盾的錯誤的平庸的，一些時候與其說是教授真實道不如說是維護權威。

也許有人會懷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成長起來的那一代人受他們父母的影響比較大，典型美國人，以『對別人言聽計從』的大人們將虛偽強加于對道德敏感的子女。在一九六〇年代後期一九七〇年代早期筆者曾經在幾個大學里教授戰爭時代的青年人，這一次相關的問題被那時的風尚弄得可憐的清晰。虛偽滲透著可怕的迷亂混合在流行的政治題目和其他流行題目當中，在一九四〇後期和一九五〇年代的麥卡錫主義抓住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回來的一代，而這一代人的歷史又預兆著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到一九七〇年代早期他們的子女在大學里的道德淺薄和玩世不恭。

筆者自己的智慧和道德形成于十二歲的青春時代，那時系統的閱讀了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法國和德國哲學家們的著作，從培根到康德(Kant)。在那個階段，作者本人掌握了他一生貢獻于萊布尼茨立場的意向，同時反對培根，笛卡兒，牛頓，休漠(Hume)和康德等人。于是，在作者的青春期便養成了檢視他們的立場，檢視他們命題背後隱含的公理性假定，這使作者從更全面更深刻的角度去看待教科書和課堂教學，從更深刻的角度去討論它們。在這種情況下，作者發現了在成年人和同齡人在公共場所中不真實習慣的更深刻更丑惡的一面。

請試著想象一個青春期的少年同他的父母或

者老師的如下對話情形。少年說，「我不能接受那個假定。」

長者斥責少年說：「等你真正懂得了掌握了這個領域以後，你才有權力詢問假定的問題。在那以前，你的任務是學習被教授的知識，你沒有權力問這些問題。」長者發出的斥責提出了現在課堂數學當中普遍接受的原理性假定，例如；當少年時代過去以後，也許他或她正在研究院修習有關那個問題的研究生學位，但他早已忘記了早年閃現在頭腦里的蘇格拉底式問題。【6】

在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六〇年代期間，耶魯大學的心理分析學家勞倫斯·庫比 (Lawrence S. Kubie) 發表了同上述問題相關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成果指出現代課堂和教科書教育損害年輕知識分子的創造能力。庫比強調學院式「練習和演算」的教育對學生創造能力起破壞性影響。他可能已經把現代高等教育的這種病理特征與康德否定之否定的道德疾病等同起來了。或者簡單的說，相當于牛頓非理性主義教條的毒害。

良好教育的本質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達成共識，教育者不教被教育者也不相信任何不能確定為真實的東西：武斷的假定不受容忍，天真的假定要以蘇格拉底式的查驗抓住其錯誤。這要形成一個道德原則，一旦這個道德原則遭到背叛，一旦由於照顧權威而放棄這個原則，智慧的力量就會受到損失，就會使受教育者的頭腦變得愚蠢，也許會造成永久的愚蠢。極少有人具有內部強大的道德力量足以對抗德育教授們以教科書形式對形式的道德毒害。當然，在現代美國典型教育下這種情況就更少。

以「教科書式」教育所完成的道德欺騙和對學生頭腦的愚昧，具有一種特殊的性質。對於第一印象來說，它便是呆板的干如黃塵一樣乏味的形式主義，就象今天在大學課堂講課教學的情況一樣，成為智慧發揮的墳墓。舉例來說，閱讀象干枯沙漠一樣單調乏味的羅素－懷海德 (Russell-Whitehead) 之數學原理就是一個實際的體會。從深層的角度考慮，在上述的情形當中沒有上帝之愛的閃光存在，沒有上帝之愛這種我們從兒時便已體會的，給我們真正創造性發現的喜悅，能力和閃光。

將精神生活中的感性和理性分割開來的說法很流行，然而並不合理。真正理性的實踐發生在

尋找「理性的閃光」上邊，發生在尋找特別的同我們內部的資質相聯系的「愛德」的感性，發生在同發明有關的，滿腔熱忱的公理性－革命性心理活動中。這是一種感覺動機上的力量，這種感覺的力量乃是提供理性力量的源泉。有人可能會稱之為「對真理的情感」。這種對真理的情感被「練習與演算」形式主義的方法或者類似的「馴服訓練」方法所消弱，從總體上對兒童的培養是極為不利的。「我將誠實的講出我所知道的事情」一句話被娼婦的「我會講真正對我有好處的東西，我會試著讓我自己相信我奴顏的淫婦嘴唇所說出的話真正代表我個人感覺上的實際利益」所代替。

沒有對真理的情感，生命就從知識旁邊流逝而過。在知識中便沒有享受，然而只有令人惡心的，十分罪惡的，完全的非基督徒的康德式的玩意兒：便會去接受那種否定之否定的流行意見。

正如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所寫，如果沒有上帝之愛，「我的話就象吵鬧的鑼和響亮的一樣。我即使有講道的才能，有各種知識能夠洞察各種奧秘，甚至有堅強的信心移山填海，若是沒有上帝之愛，我就算不了什麼。上帝之愛…乃是真理的喜悅。」如果沒有對真理的愛，就沒有對真理的知識和表達。

為了想要真理之愛，律師們，證人們，法官們在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撒謊，這既是實際當中的所謂司法正義。在學校當中也是如此，在科學書籍當中也是如此，在立法機構當中也是如此，在公民選舉箱中也是如此，人們用刀刃刺殺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子孫以及他們自己。這種悲慘的道德衰落是無法改變的，除非人們重新愛上帝，愛人類，愛這個世界。

上帝之愛滲透人類的創造，這反映出上帝並非虛構，上帝對人類之愛具體到賦予人類創造性的智慧而超越了簡單的存在，超越了時間和空間，沒有上帝宇宙都不會存在。

對技術進步之愛

一般技術進步的過程表現了上帝之愛與人類在宇宙存在的實際理解之間的關係。

這種一般技術進步可以表現為實踐命題的集合，每個過程均由革命性發展的一般假說明確而有效地包含著。在這種方式下，每一種技術革新

都屬於命題系列當中的一個，其設計的重要原理包含在一個特殊的假說當中，相關的原理創造性發現也在其中。

對于此類的典型實例，其發展過程的各個步驟簡述如下。

帶來技術原理改進發明的過程，往往不是從感性知覺開始，而是從智慧性的目標開始，從反常現象的存在開始。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物理學領域的現象需要新的解釋，因為它違反已經存在的數學物理原理。例如普蘭克(Max Plank)發現了開普勒反射(Kepler-echoing)量子原則，從而改變了伽利略，牛頓，歐勒(Euler)和麥克斯威爾(Maxwell)所描述的世界形象。

如果我們應用柏拉圖的巴門尼德篇對話的原理對待本體論矛盾的方法去對待這種反常的情況，它就會把我們領向一個新的數學物理領域，一個基于同舊物理學的基本理論數學物理教條不一致的假說所支持的一種新物理學。普蘭克的科學發現在一般原理上同黎曼的住校教授論文是一致的，同門得列耶夫化學元素周期表所體現的原理也是一致的。普蘭克本人遭到了三K黨式私刑的攻擊，攻擊者是舊物理學的保衛者麥克斯威爾和馬赫(Mach)的追隨者以及一九一八年以前的實證主義哲學家們，顯示著認識論矛盾解除的特徵。

新的假說需要一個原理的證明，證明特殊的反常事實支持這種理論的發展。愛因斯坦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認識到在光電效應中顯示的量子原理具有這種敏感的實驗意義。

一旦原理證明完成，下一步便是在更復雜的條件下重複它們，發現與新原理相關的更多的問題。再下一步便是將這些發現的原理應用到全社會的機器工業中。如此從敏感的發現開始，一直到機器工業的應用，整個過程產生了一整套的原理，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過程。

如果我們將這種機器制造的原理同新技術對勞動生產的關係集合起來，這個總的結果便是人類勞動生產能力的增長。【7】

這便是自然哲學上的創造性發現之典型過程，這個過程增加了人類潛在相對人口密度的發展能力。在人類創造性原理的作用下引起的這種增長，是人類區別于動物并超越于動物的根本標記。通過如此特殊的，從愛德而來的人類創造潛力，對每個人都是如此，每個人都知道他是上帝

形象的反映，是上帝的形象在人類個體當中的反映。

這種情形並非只是反映在「特殊的」個別人身上，其他人便不具有創造性的能力；也並非只有什麼能夠有靈感想象的集體人們才能具有。這是一種宇宙性的，在這個人類中普遍存在的每人都有的上帝賦予的能力。這既是，創造性存在於個人的內心，但不能在人與人之間隨便轉換。人不能以交流的方式同他人溝通創造性的精神活動，如果人堅持要他人重複他自己內心的創造性精神活動，只會引起他人的憤怒。人在生活中可以感覺到這種現象的發生。

於是人類便奉獻給神：原因是人類個體的創造性潛力乃是來自于上帝的現象。如果沒有上帝之愛使人類具有創造性的智慧，人間男女便與野獸沒有任何的差別。由上帝之愛而來的人類創造性帶來了對上帝之愛，對人類之愛，對世界之愛。如果沒有創造性的愛，人類除去獸性外便什麼也沒有，人類個體便一個個走向滅亡最後從世界中消失。

古典藝術形式中的上帝之愛

目前為大學和專業圈子所廣泛接受的審美教條中，大部分應屬於公開的欺騙，這些欺騙根植于非理性傳統的經驗主義，浪漫主義，實證主義，種族主義。

這方面爭論的例子在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和海涅(Heinrich Heine)揭露康德(Kant)在審美教條上猶如納粹魔鬼一般審美觀點的批評當中提供了範例。席勒的重點是放在坎特降格的審美教條上，降格的審美教條在康德最後的重要著作「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中有著詳細的表述。海涅提出的批評同席勒是一致的，特別是海涅經歷了法西斯王子梅特尼奇(Prince Metternich)的卡斯堡通令和梅特尼奇的代理人，作為德國「國家哲學家」的黑格爾(Hegel)對席勒作品的禁止和迫害。

在音樂方面，李斯特(Liszt)，瓦格納(Wagner)等人浪漫主義的非道德來源于康德「判斷力批判」之中心部分：康德象實證主義者弗洛依德(Freud)和所有的經驗主義者一樣，拒絕世界存在任何創造性發現明白可知的原理。從其「判斷力批判」的中心前提中，康德得到了浪漫主義審美學派的教條，以及世間不存在關於真或美的明確標準。

所有的浪漫主義者，如瓦格納著名的“Tristan und Isolde”中的“Liebestod”一幕，如李斯特，如白遼茲(Berlioz)等人反對存在于巴哈，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等人當中的愛德情感，取而代之的是要求音樂對性愛欲望的表現。一度的馬志尼式(Mazzinian)擲彈手瓦格納曾經象他的恐怖主義同盟巴枯寧(Bakunin)一樣，痛恨貝多芬，公然宣稱他自己要致力于毀滅貝多芬的影響。

更糟的是，為這種道德衰落原始納粹恐怖主義者們如瓦格納之流的辯護者們成功地影響了音樂界中的作曲家和錄音帶師們，使謊言成為正是的教條，宣稱音樂的『古典時期』之後是一個『浪漫時期』，諸如此類。這種毫無根據的任意武斷的意識形態常用來標志在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議會之後所有音樂作品，則全標為非理性主義者的浪漫主義或至少是『興起的浪漫主義時代。』

在這種持續的腐敗影響之下，貝多芬的最後作品，反浪漫主義的嚴謹的古典主義作品，竟然被音樂批評家解釋為浪漫主義作品；舒伯特的作品則被解釋為全部是浪漫主義的；欺騙走到了如此無恥的地步，以至于十九世紀最後一個浪漫主義作曲家去世以後，從創作動機到實際作曲都充滿古典主義的勃拉姆斯(Brahms)的嚴密古典作曲硬是被那些審美主義惡棍說成是浪漫主義的。【8】

可憐的是，被可怕的欲望弄得歇斯底里的音樂家們正好保衛了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成功的將國際公認的『A音』升高到440周。以浪漫主義方式演奏古典音樂去同時尚調節。在這種情況下，古典作品在現代最有名的音樂家演奏下竟顯得不堪入耳。

為何所有現代的審美教學純屬欺騙，不僅是音樂而且詩歌，戲劇，繪畫等等都是如此？或者直接的說，為何古典藝術形式的道德層次絕對超越其他任何選擇呢？何為創造性的效果在古典藝術的形式下導致人類人口潛在相對密度的增加呢？創造性任何能夠在古典藝術形式中，在物理科學中以每平方公里每戶每人的方法增加人類駕馭自然的能力呢？什麼是古典音樂在宗教生活中充當角色呢？

上述問題答案的核心如下。同樣的創造性的原理，上描述了以創造性的原理自然科學中優先原理的發現，乃是音樂中所有古典形式作曲和表演的杰出特征。這種作曲和表演的原理適用於所

有的藝術形式：音樂，詩歌，戲劇，繪畫等等；古典藝術的實質是在作曲家，表演家，和聽眾觀眾中喚起愛德的本質，喚起理性創造的力量去解決問題而其他力量所無法替代。這是上帝之愛的喚起而非性欲衝動的刺激，它是藝術美的內涵，它是觀眾内心反映的適宜表現形式，它表達了藝術真實的原理。古典藝術乃是真實與美麗，美麗與真實。

在古典悲劇藝術形式當中上述原理能夠得到廣泛的說明，這些悲劇相關的作者是埃斯庫羅斯(Aeschylus, 525?-456BC, 古希臘劇作家——譯注)，瑪婁(Marlowe, 1564-1593, 英國劇作家——譯注)，莎士比亞，席勒。這些可作參考的例子回答了下述問題：為何一個悲慘的結局成為偉大戲劇的根本？

所有的藝術都從席勒定義為『孕育的時刻』作為起始點。在這個起始點緊張的情節為藝術家所展開。觀眾可能不會從外邊完整的體會到這一切，但隨著情節的展開，觀眾會經歷到奇異的情節變化。天才的火花使藝術具有不僅僅是娛樂的價值，在那孕育的時刻，藝術品中存在著一個反常，這個反常同科學中引起現存數學物理大變革的反常，在本質上完全一致。

在悲劇當中，反常由選擇包含生死攸關的威脅或者血緣中的各種矛盾所組成的孕育的時刻。如果戲劇中的角色按照他們的定位去發展，他們最後便遭到毀滅。只是當他們認識到必須在公理上加以改變問題才有可能解決時，他們才有機會逃脫毀滅。因此，偉大的悲劇人物提供了實際生活中的原理，原理適合戲劇中的情節。盡管劇中的情節可以有解決的可能，但是其中的人物沿著老路一直走下去，從而遭到毀滅：如此引出悲劇的第二個關鍵點，便是情節高潮，突出刺激。

可以回憶莎士比亞劇本哈姆雷特當中的情節。從第三幕哈姆雷特著名的獨白可以了解這種突出的例證：

死亡之後的恐懼，—
那界限之外未知的國度，—
迷惑的意志，前行者一去不返，
它使我們寧肯忍受痛苦
它是否會傳向他人？
良知都使我們成為懦夫；
加入完結的天真叫聲

弱病的蒼白思想；
大的進取精華和時機，
連接至此，他們離去，
失去行動之名。

從這一點以後，哈姆雷特執著的按照他的命運向前走，直到悲劇的結局。從哈姆雷特嘴中的獨白預先顯示了他自己自身的缺憾。觀眾從此看著情節因此展開。侯拉提歐(Horatio)在劇終時說：

讓與此相同的事情發生吧，
盡管人們的心是野蠻的；
恐怕還有更多的誤機圖謀和錯誤發生了。

是觀眾在看著角色頑固的避免問題的解決而走向他們的結局，那便是悲劇藝術的關鍵點，它在道德上提升了悲劇的質量，這就使席勒的觀眾們經過劇場後便有所提高。

同樣的原理可以擴展到所有的古典詩歌，無論詩歌是否悲劇都是一樣。一個反常被表現出來，詩人在聽衆的心目中展開了一個暗喻。一個語法家在詩歌創作時的企圖應該永遠跟從藝術的需要；藝術和亞里士多德主義原則是不可錯用的。

古典音樂是表現上帝之愛的最純正形式。古典音樂作曲的最高形式乃是起自于海頓(Haydn)作品第33號的第三弦樂四重奏，海頓在創作這個作品時從動機到思想均為古典形式，隨後古典音樂的原則被莫扎特以改寫一七四七年巴哈的"Musical Offering"而精心歸納成型。在古典作曲形式中，一對音程被設定在作曲之外當成整個作品的孕育時刻。在整個作品當中，沒有任何不同孕育時刻相聯繫的東西存在；整個作品從起始點開始通過若干在作曲公理下之革命性創造而完整的連貫下來。在這種孕育當中，感情和情緒的質量規範著整個曲調節奏和反點，上帝之愛作為創造性轉換的核心貫穿整個作曲的始終。

在繪畫藝術當中，達芬奇的"Virgin of Grotto"，和拉斐爾(Raphael)的"Transfiguration"所表現的創造性原理，同黎曼在他那篇著名的論文所表現的原理是一致的。

這個原理是整個創作過程中最重要な原理，上帝之愛所引發追求真理的感情刺激，乃是古典藝術形式區別垃圾一般的浪漫主義或者現代主

義的本質。特別是在古典音樂當中，這種情形為海頓—莫扎特—貝多芬所確定的對位動機作曲法表現的最為清晰。在總體的古典藝術形式當中，上帝之愛乃是推動藝術創作的根本力量。它貢獻給上帝之愛，就象基督使徒約翰和保羅所理解的那樣，真理便是美麗，美麗便是真理。

真理之創造理性

儘管有夏皮在荷蘭英國後來是法國領導智識生活的相對成功，真正的科學卻在形式主義數學的窒息下趨于死亡；科學的位置被工程學所取代，工程學雖然十分有用，但它不是科學。然後，大約三十年以前，在非理性主義的「新時代」篡改之下，工程學也開始窒息，其情形如同一九二〇年代擁護羅素索維(pro-Bertrand Russell Solvay)會議之後科學遭到窒息的情形一樣。【9】

這種窒息科學的特征來自于如下的過程，偉大的開普勒所理解的理性論被惡毒的小人培根，伽利略，福拉德(Robert Fludd)，笛卡兒，和牛頓等人所主張的因果論排擠。兩者之間的本體性差別在此真正顯現出來，開普勒的理性論源自于柏拉圖的高級假說原理，伽利略和牛頓的因果論則認為時空中的線性測量是直接的視覺影響。後者在本體上比前者低下兩個數量級。

規定一個目標，在一個衝擊之下，整個系統會如何反應呢？或者將一個反常介入已存在的物理時空系統：結果將是什麼呢？科學真理不會對任何假說的理論撒謊，但是它喜好真正反映了客觀真實修正舊有假說的那一個。開普勒將理性論放到了高級假說的位置上。

在此重申，感性的原因不會象射擊或者射線在特殊現象之間傳播發生。變化結果的原因可歸于黎曼所定義的時空曲率。這個曲率屬於高級假說領域，它反映上帝的法成功的統治著高級假說領域；這是智慧法在物理時空中的表現。這是開普勒和萊布尼茨的理性論。這便是科學真理。

科學與古典藝術相通

為了表現一個關鍵點，讓我們把注意力拉回到藝術悲劇，這次回到希臘悲劇詩人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的悲劇普羅米修斯，回到這部悲劇的孕育時刻。除去這部悲劇之外也許沒有任何其他戲劇如此直接的將受到真理影響的國家政策和神學

聯繫到一起。

在傳奇當中，普羅米修斯被捆綁在一塊岩石上，被宙斯所領的奧林巴斯諸神所懲罰，因為他傲慢的反對那些異教徒的諸神。在埃斯庫羅斯的戲劇中，一個反常出現了：宙斯自己的命運被一個更高的力量所確定，而這個命運的實現卻需要宙斯自己來完成。

這個宙斯是誰？這些所謂的奧林巴斯諸神是誰？所有與此相關的傳說，無論是埃斯庫羅斯的寫作還是其他作品都指出了一個關鍵的根源，也許是一個由『海上人』建立起來的王國，一個富有的王國在大約今天摩洛哥的地方。在神話里邊海上人變成不朽的，變成了奧林布斯的諸神。在這個故事里，他們變成了人類致命的敵人，但是人類為大力士普羅米修斯所保護，他為人類帶來了火和其他技術從而使人類自宙斯的奧林匹克王朝里活下來。

在表面上，普羅米修斯因為違背宙斯的意志而遭到懲罰。但是隨著劇情的展開，普羅米修斯被拷打說出宙斯自我毀滅的秘密，宙斯希望知道自己的秘密以便避開他的毀滅。在此宙斯的悲劇命運是：他將被自己任性的欲望所結的果子所毀滅。在普羅米修斯戲劇第一部分結尾的時候，普羅米修斯被痛苦拷打，他等待著在奧林巴斯諸神的曙光中宙斯的毀滅和自己的解救。

在此，基督使徒保羅所言之希臘未知神被充分的表現出來，它表現了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540?-470?BC, 古希臘哲學家-譯注)的理性和柏拉圖提麥斯篇的對話(Timaeus)的神。

普羅米修斯戲劇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在實際的歷史當中，直到一四四〇年佛羅倫薩(又譯翡翠冷)理事會成功的進行了國家政策的革命，【10】包括在所有文化當中生活的百分之九十五人民都處在農奴制奴隸制或者更壞的生活環境之下；在古代沒有『好的』社會，沒有一個文化中是沒有魔鬼的。剩余的百分之五的人口當中，可以分為兩個階級。在頂端，是有力的統治家族，相當於現代歐洲的貴族。在王朝之下，以僕人的階級存在，軍人，牧師，職員，商人等等。普羅米修斯戲劇實際上是古代真實生活的縮影。

普羅米修斯戲劇的這個方面還具有另外的公理性意義。普羅米修斯是一個古代希臘的科學知識形象，他因此也是真理的化身。戲劇中最初對

普羅米修斯的控告是他把科學和技巧帶給了人類，使人類能夠從宙斯欲將人類毀滅的災難中解救出來。

埃斯庫羅斯的戲劇普羅米修斯也許應當加一個『宙斯的悲劇之死』副標題，普羅米修斯戲劇本身劃出了一條線，這條線通過索侖(Solon)在雅典的改革將希臘埃歐年(Ionian)文化同柏拉圖科學院連接起來。它表現了在古代希臘文化中魔鬼的奴隸社會和人道平等的分野，前者是里克古斯的斯巴達(Lycurgus Sparta)，後者是索侖的改革。它代表了佛羅倫薩會議和法國路易十一聯邦制對社會改革的渴望同王權社會魔鬼的區別。它達到了高子宙斯王權魔鬼的上帝。

在這種情況下，古典詩歌，古典音樂，古典戲劇，古典繪畫都是道德和法律的偉大教授，優良的社會組織形式既是依賴于這些法律和道德。如前所述古典藝術基于來自上帝之愛的創造性原則，這便是高級假說在自然科學和技術進步中之集合。藝術是科學之母，精神如果得不到營養科學的努力就會失去生命。藝術的意義是使男人和女人能夠吸收來自上帝之愛的創造性原理，而這些原理是一個成功的社會所必須具有的。

在藝術和科學當中所貢獻的上帝之愛，乃是真理的價值。

我們以此與東方社會相比較，在南亞東亞和東南亞進行對比。這是印度教沙提和西通Shakti and Siva)徘徊的領域，在歷史上它的主體是佛教。除去摩西傳統的影響之外，中東的情況一致很壞，甚至比亞洲其他的地方還壞。然而在古典儒家和梵語傳統共鳴的時刻，亞洲的悲慘傳統是皇權，也許不象墨西哥原居民那樣壞的魔鬼情形，但是生存環境總體上是不好的，百分之九十的人們生存狀況不好。

這並非是拒絕人道主義對古代亞洲文化的情意。象印度和波斯一樣，歐洲文明的語言文化也源自于公元前四千年的由古代梵語聖歌而典型化的中亞文明。在古代中國的生活中有若干偉大的時期，在這些時期中所有的人道主義都得到益處。但是，盡管在這些文化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依然生活在僕人，奴隸，甚至更壞的環境中。

這種殘忍單調的生活，一代又一代的傳下去，使那些擁有特權的和被壓迫的靈魂都失去了感

覺。要愛，一個人必須注視另外一個人的眼睛，知道那眼睛後邊有一個真正的靈魂；人類並非一定要以這種方式去愛，而沒有愛一個人便是空的。在一個除去少數統治者外，其他人都生活在殘忍的壓迫之下的生活里，那些凶殘的暴君任意以他們的特權壓迫人民，乃非任何人類的生活。沒有改變的希望，麻木成爲人們從現實實際里無邊的痛苦中逃避之唯一心理方法。靜修士（Hesychasm, 屬希臘正教，源于十四世紀聖山神秘教派——譯注）乃是從現實中的逃避，它不是一種哲學，也不是一種宗教，它只是一種鎮痛劑。十五世紀的基督教文藝復興乃是佛羅倫薩會議的中心，它反映著路易十一作爲人類社會聯邦制度的開拓者，爲全人類帶來了脫離王權制度的希望。不幸的是封建王朝在十六世紀和隨後的幾個世紀贏得了勝利，他們控制了這個人類文明的新形式，他們是憎恨人類的力量，在科學和技術在他們手里掌握的時候，象宙斯那樣的魔鬼便決定毀滅科學技術的未來發展。

盡管這種同邪惡的抗爭是艱苦的，在路易十一的法國首先確立現代國家憲法的制度，它爲人

注釋

(1)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佛教「禪家」(Sangha)（斯里蘭卡主要的全國性佛教組織）警告說，如果教皇保羅二世不就其最近發表的一本名叫《跨過希望的門檻》一書中的觀點道歉的話，他們就要掀起一場運動來抵制教皇對該國的訪問和會見。這些和尚們形容該書的內容是：「中傷、誤導和蓄意歪曲。」教皇保羅二世的《跨過希望的門檻》（紐約：艾爾佛雷德·A·克諾夫出版社(Alfred A. Knopf, 1994)，一九九四，由維脫瑞奧·梅素理(Vittorio Messori)編輯）。內容是他向教皇提的問題以及後者的回答。

(2)這個日期剛好與德國詩人席勒證明索倫的改革傳統和奴隸主斯巴達傳統是歐洲文明的兩個顯著特點的時間相同。

(3)伊莉莎白女王的親夫菲力普·蒙巴頓親王(馮·巴騰堡)已不止一次地宣稱他寧可信奉自己所選擇的古代的異教地母伽雅(Earth-mother Gaia)也不想信奉摩西、基督教或伊斯蘭教。伽雅是Shakti-Siva, Ishta, Isis-Osiris, Cybele-Dionysus, Satan等等以及其他地方崇拜的偶像。他們都是在古代德爾菲(Delphi)地區靠近她的

類開啓了真正自由的大門，這是直到五個世紀以前人類當中從來也沒有的事情。一旦我們擺脫獨裁力量，這也許能在下一個十年中實現，自由，盡管它不是天堂，將會在全人類實現；那時人類的理性時代即將開始。

這個自由不是魔鬼亞當斯密非道德意志的自由，它是自由參見提高人類生存環境的權利，這個目標通過全人類最關鍵的創造性藝術發明和創造性科學發明的再生來實現，同時通過我們創造性心理活動力量的培養和實現，爲人類的文明發現作出貢獻的喜悅均在此得以實現。爲了這個目標而生存，是如此的熱愛這個世界，以至于決不會輕易放棄它，因此而更加熱愛人類，去爲可愛的上帝服務，爲偉大的造物主。

沒有摩西在聖經創世紀第一章25—30節中所述的上帝，沒有基督教在一四四〇年佛羅倫薩會議對人類生活的喚醒，以上所述是不可能實現的。親愛的朋友們，這，就是一個科學的事實，是真理，相反的則不是真理。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八日

神廟的地方。她則是當地阿波羅一女巫—狄俄尼索斯的崇拜者們的保護神；對她的情人撒旦巨蛇女巫者流的敬拜由阿波羅的教士們以阿波羅的名義所布置的任務中在女巫—狄俄尼索斯的墓地表演神諭的功能。所以親王公開宣稱的宗教傾向就不僅是一般的異教問題而是信仰魔鬼的問題。因為這種多形的伽雅—女巫—狄俄尼索斯—阿波羅意味著一千多年的歷史。

(4)凱恩斯爵士等人在本世紀為牛頓開胸的實驗報告只不過是一樁著迷于燭心利欲的黑色魔術的實踐，對科學毫無貢獻。

(5)早在七百多年以前埃及的埃拉托色尼就估算了環球子午線的大致角度并由此估算出地球的直徑約為7,850公里。

(6)對於提前入校的小學生而言，當他們因爲學習障礙而提問題的時候，其實這種提問一半是問問題一半是有障礙。有一種方法通常可以幫助孩子們建立概念。在最糟糕的情況下正確的回答一般表現為下述形式：「讓我來舉一個例子。它應該能夠很好地幫助你理解你的問題。」實際上你不能指望每一位家長和

老師都能夠找到他需要的例子。然而，如果科目、參考題、師資培訓和課程設置都具有足夠的競爭性（正如大多數不具備），所有這類學生可能廣泛地面對的至關重要的概念問題原本是可以提前得知的。

(7)「勞動生產力」這個詞是美國財政部長亞力山大·漢密爾頓于一七九一年十二月給美國國會的一篇名為《製造論》的報告中所采用的。該詞起源于科學經濟學的創始人萊布尼茨的「實物經濟科學」。這樣講是為了同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大學里講授的經驗經濟學的垃圾相區別。用下述方式測量「勞動生產力」就可以得到一個不錯的近似值並給出某一個標準的技術水平及估計壽命和計算所有為維持該水平質量之再生產的消費清單等等。在測算這種「市場筐籃」的時候必須注意以下三點：(1)生產方面：人均生產支出和投資。(2)家庭需要：平均每戶和每人消費。(3)平均每平方公里地表面積可以直接或間接地用于生產、運輸和居住的能力。有四種類型的「市場筐籃」：(1)實物經濟的基礎設施：水利和土地改良、基礎衛生設施、基本交通設施、動力生產及輸送、基礎通訊設備和城市基礎建設；(2)軟件的基本建設：醫療衛生、教育和科學；(3)制造和消費品德實物組成部分；(4)必不可少的家庭生產單位和消費者的服務成分：醫療衛生、教育和科技。測量這些社會中自產自銷的指標（人平、戶平和每平方公里的地域）所需的輸入表示

社會再生產的「能源系統」；產出超過投入的增長部份可稱為該程序中的「剩餘能源」。勞動生產力的變化可恰當地用這種方法進行大致的測算。

(8)這篇批判的內容使我們想起兩位一直活到本世紀的浪漫主義作曲家雨果·沃爾夫和理查德·斯特勞斯。除了他們所適應的浪漫主義流派之外，兩人都被認為具有天才的音樂家素質。一種由詩一般的發聲成就所表現出來的素質。沃爾夫在勃拉姆斯創作《四首莊重歌》之前就得了一種精神病（可以認為是一種死亡）。公平合理地說，斯特勞斯最好的作品是在他創作的歌曲里找到的。這些限定的條件表明正文的陳述中對勃拉姆斯表示尊敬，但在這兒的演說中只相當是一個速記。

(9)就這點而言，愛爾伯特·愛因斯坦對老朋友羅素的胡說八道的戲言，如講尼爾斯·波爾說：「上帝不擲骰子。」也只是退出討論而已。在他的環境和許諾上愛因斯坦的弱點表現在沒有詛咒他同事中的這幫腐朽墮落之騙局的同謀者們。

(10)由佛洛倫薩議會影響的真德的法國、共生兄弟會教育的主教托馬斯·A·坎賓斯、青年紅衣主教尼古拉思庫薩(Cusa)和其後鹿特丹的依拉斯姆斯(Erasmus)的影響下，法國國王路易十一世建立的共同體標志著第一個現代形態的民族國家的誕生。